

## 中國大陸近年在舊石器時代 考古學上的一些發現

賈蘭坡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 一

近年來發現的古人類或古文化遺址，以舊石器時代晚期所佔的比例較大。100萬年以前的古文化遺址仍以1981年衛奇等發掘的河北省陽原縣東谷坨遺址最為重要。這個遺址保存在灰綠色砂質黏土頂面之下約40米左右深的地層裏，論遺址之大、材料之富，都是世所罕見的。遺址向西、向北延伸到1公里以外，石製品密度遠遠超過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石製品原料為流紋質火山碎屑岩、石髓和燧石，也有少量瑪瑙及輕度變質的石灰岩。類型有石核、石片和用石片製作的刮削器、尖狀器和砍斫器等，此外還發現骨器。〔圖一〕（衛奇，1985）這個遺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石器多是小型的，器型和打製技術與北京人的頗為近似，因而可以認為北京人文化來自於東谷坨文化。〔圖二〕

最近幾年，考古工作者在邊疆地區進行了相當艱苦的工作。在西藏，前後發現了十八個地點，但絕大部分都是在地面上采集的。估計時代可能是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有的可能更晚。但不要小看這批材料，因為它不僅可以說明藏族的歷史逐漸在延長，也為青藏高原抬升的速度提供證據。據統計（錢方等，1988）發現石器的地點最高海拔為5,200米，最低為3,100米，平均為4,341米。據說在3,500米以上地帶人烟非常稀少；由於空氣稀薄，不用高壓鍋連飯都煮不熟。

關於公開發表的新疆原始文化，從前德日進（Teilhard, 1939-40）從哈密到吐魯番之間的七角井公路旁發現過屬於新石器時代的一批細石器材料，他把發現到的石核和阿拉斯加中部所發現的同一類型石核相比，認為在新石器時代黎明時期亞洲和美洲人類文化在接近北極地區曾有過聯繫。在50年代初，我還為地質部鑒定過來自喀什的一批和七角井類型相同的細石器。同樣的細石器在蘇聯的亞洲部分和阿富汗也都發現過，證明幾千年以至萬年此種細石器文化已經廣泛分佈。1987年黃慰文和歐陽志山等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南緣又發現了打製石器六處，其中有三處劃為細石器類型。發現的材料不多，而且都采自地表。據作者

估計，時代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這批材料的發現，不僅可以說明文化的性質和分佈情況，還可以說明當時當地的自然環境。據作者說，那裏是沙漠地區，沒有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是無法進入的。從這些石器的存在可以想像得出，當時當地的自然條件要比現在好得多。

1974年，我們在內蒙古進行過一次考古調查。從呼和浩特出發，經包頭、白雲鄂博、白靈廟、滕格淖爾、腦木根、二連、東蘇旗、集寧，最後又回到呼和浩特，乘兩輛吉普車繞了一圈。從呼和浩特出發之後愈走愈荒涼，特別是從腦木根東去，中途盡是戈壁，汽車開行速度每小時為40公里，跑半天也不定看到蒙族居住的帳棚。可是停車休息時，卻偶爾可以從地面上檢到細石器。有些較大的遺址現在附近也無人烟，證明數千年前並非如此荒涼。1948年，我們曾和裴文中先生到甘肅河西走廊進行過第四紀地質和考古調查。我們是乘大篷卡車去的，從蘭州到敦煌、柳園，幾乎走了河西走廊的全程。所經之地雖然遍地岩漠，卻能不時地見到燒得非常堅硬的磚，有的被風吹成了礫石。在荒蕪的戈壁灘上還見到有製造鎧甲的遺址，地面上遺有許多銅甲片和熔爐遺址。在張掖縣城北15公里，有個地方叫「黑水國」，當地人傳說就是《西遊記》裏的「女兒國」。黑水城在黑水橋西南約2公里，已為砂子所埋沒，尤其是西北兩面的城牆被砂子埋沒得最高。我們沒有走過城門，只是從砂丘上就爬進城去。城內遍地磚瓦和盆罐，街道依然可見。（賈蘭坡，1948）這說明從前河西走廊也並非像現在這樣荒涼。

1982至83年間，考古工作者在廣西百色縣高階地的地表上工作，從二十一個地點采到很多石製品，它們分佈於右江兩岸高階地的紅土層表面和剝蝕溝中。石製品有尖狀器、兩面器、砍斫器和石核等，都是大型的，石料為石英岩、砂岩、硅化岩等礫石。（何乃漢等，1987）在器型上和丁村發掘所得有些接近。

最重要的還是最近在雲南元謀縣班果盆地竹棚發現的「東方人」和蝴蝶梁子的「蝴蝶臘瑪猿」。這個發現對人類起源問題有着重要意義。遼寧省營口金牛山人化石的發現也很重要。遺址不僅有比較完整的頭骨，還有部分身體上的骨骼。遺骨毫無疑問屬於早期智人（與尼安德特人相當）。用鈾系法測定為24.7萬年，相當於北京人遺址的上部堆積。這也就是說，當進步的金牛山人出現的時期，北京人還生存在世上。

1981年，在山東沂源縣騎子鞍山東麓發現一處含有哺乳動物的紅色堆積物，9月18日發現人類骨頭碎片，包括頂骨一塊、眶上圓枕兩塊、部分額骨和枕骨。和人類化石共存的哺乳動物有腫骨鹿（*Megaloceros pachyosteus*）、李氏野豬（*Sus lydekkeri*）和三門馬（*Equus sanmeniensis*）等。（徐淑彬，1986）從人類化石性質看，這些骨頭碎片與北京人骨相近似，時代約與中更新世晚期相當。可惜這批材料，現仍保存在山東省博物館，除了徐淑彬寫的一篇簡短的介紹（徐淑彬，1986）外，迄今尚無正式報告發表，即使是對化石的簡單描述也未見。

還值得一提的是遼寧省海城小孤山洞穴遺址。這個遺址是1981年發現的。1983年遼寧省博物館組織省、市、縣有關部門以及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進行了發掘。（張鎮洪、傅仁義等，1985）這次共發掘了大約350立方米堆積物，約佔洞內堆積的70%。在下

部屬於晚更新世地層中發現有人的單個牙齒五顆、幼兒股骨殘片一段、石製品約萬件、骨角製品六件、穿孔獸牙裝飾品七件和哺乳動物化石三十八種。

石製品幾乎全部採用脈石英礫石或岩塊作原料，除了石核和石片外，器物有刮削器、尖狀器、石鑽、雕刻器、砍斫器、兩面器和石球等。在骨、角製品中有一件魚叉、一件骨錐和三件骨針。〔圖三〕舊石器時代魚叉是首次在中國發現的，表面有鋸、切、削、刮的痕迹，兩側有倒刺。裝飾品用小食肉類和鹿的犬齒鑽孔而成，與周口店山頂洞發現的裝飾品頗相類似。這般古老的裝飾品也只有山頂洞和這個洞穴裏發現過，時代和山頂洞相比也大致相當。

## 二

根據我的經驗，凡是一種新的事物出現，就難免有意見分歧。中外都是如此，在古人類學和考古學上也不例外。出發點不同，理解當然各異。關於北京人是否最早的人，在60年代曾有過長達一年之久的公開討論。報紙雜誌上發表過不少這方面的文章，例如匱河文化、西侯度文化發現之初，都引起過長期爭論。後來由於比北京人更早的人類遺骸和文化遺物在國內外的發現愈來愈多，認識才逐漸得到統一。

從1987年起，在中國曾出現兩次有關古人類學上的問題的爭論。第一是關於「蝴蝶臘瑪猿」和「東方人」的問題；第二是關於「金牛山人」的問題。先談第一個問題。自從1986年在雲南省元謀縣班果盆地發現「人猿超科」的牙齒之後，雲南省博物館、元謀縣博物館、楚雄彝族自治州和雲南省地質局等單位於1987年進行了調查和發掘工作。「東方人」在縣城西北40公里的竹棚村附近的豹子箐發現，出土有「人猿超科」牙齒四十一顆和兩塊上頷骨。據「發掘報告」紀錄，伴生的哺乳動物有三趾馬（*Hipparion* sp.）、原始劍齒象（*Stegodon primitium*）、嵌齒象（*Gomphotherium* sp.）、鬣狗（*Hiaena* sp.）、湖鹿（*Muntiacus lacustris*）等三十餘種，原作者認為時代為上新世末期到早更新世之初，估計距今為250萬年前。

雲南省博物館張興永等研究過竹棚村附近發現的「人猿超科」的牙齒，從中選出六顆作為正型標本，命名為「東方人」（*Homo orientalis*）；在相距約1公里的小河村蝴蝶梁子挖掘了四個點，共發現「人猿超科」牙齒一百一十顆，張興永等命名為「蝴蝶臘瑪猿」（*Ramapithecus hudiensis*）。原作者認為時代比「東方人」為早，地質時代為晚上新世早期，估計距今為三、四百萬年左右。（張興永等，1987）後來由於同「蝴蝶臘瑪猿」一起發現了花崗岩碎石塊，有人認為其中某些石片上有手工打製痕迹，從而又改為「蝴蝶人」；但這一命名只是見於報紙，未正式發表過，也未給予拉丁語化的名稱。

1987年11月間，雲南省為這個發現邀請一些學者到昆明開了一次「評議會」，我也參加了，並到元謀縣進行了實地考察。對發現物的命名，多數人提出反對意見，有人認為不應訂出屬名，應訂為「人猿超科」。周國興回到北京之後接待新聞記者訪問時說，他的意見偏重於臘瑪猿。吳新智認為「負責現場工作的同志在會上介紹了有關的情況，出示了新發現的『人牙』

的一部分(約20枚)、伴生動物化石及有代表性的『石器』等。經過觀察,與會的古人類學者一致認為,出示的『人牙』屬於人猿超科,從這小部分標本本身所發表的論文均看不出訂出兩個新種或歸入人屬的足夠根據。』與會的考古學者都未能在所示的石塊和破骨中找到可以認為人工製造的石器和骨器的標本。』(吳新智,1988)對地層的看法也不一致。雲南省地質局調查的結果,認為是上下兩層,在這次考察時也有人認為同屬一層,但地質時代則屬上新世無疑。

至於班果盆地所發現的人猿超科的牙齒,由於我晚到三天,才看到了一些。據我看,人猿超科的牙齒並非一種,經過詳細研究之後,能劃分出兩、三種也說不定。我除了對發現者深表敬意外,對原作者的命名,沒有提出相反的意見,因為我還未能提出更合乎科學的名稱。我也不贊成籠統地稱為「人猿超科」;因為它包括的範圍太廣,說明不了問題。只要不超越《國際動物命名法規》的原則,任何人都可以給未曾見到過的動物建立新的名稱;當然如果錯誤的命名,任何人都有權訂正。值得注意的是,人類既是從猿演化而來,時代愈向前溯,人與猿愈難劃分,當追到人猿分野的三叉路口,恐怕任何人也難以辨認了。此時人類製造的工具會起決定性作用。但和「蝴蝶臘瑪猿」同層出現的花崗岩碎片,我在昆明時只見到了七件,似有人工痕迹,但又不很清楚。總之,我認為這是一次重大發現,對說明人類起源問題有很大的幫助。

今年《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了一個驚人消息:「3月14日,雲南省元謀縣古人類聯合發掘隊,在……城西北40多公里的小河村附近(即蝴蝶臘瑪猿化石產地),發現了一具人猿超科頭骨化石,……頭骨化石的面顱上的額骨、眉間骨、眼眶、鼻骨、顴骨、上頷骨,以及附在頷骨上的八枚牙齒,清晰可辨。」這一發現對問題的解決大有裨益。

現在談第二個問題。北京大學考古系由呂遵諤領導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實習隊於1984年9至10月間在遼寧省營口縣金牛山發現了較為完整的古代人類頭骨和部分身體上的骨骼以及大批哺乳動物化石。〔圖四〕從1984年11月起有許多報刊都曾刊登發現的消息,也惹起了一番爭論。爭論的焦點是這具人類化石究竟是屬於猿人階段,還是屬於智人階段的問題。

1985年8月9日北京大學受國家教委委託,邀請了六位專家參加「金牛山化石科學鑒定會」。鑒定書說:「營口頭骨化石的形態明顯比周口店發現的北京猿人頭骨為進步,而與陝西大荔發現的早期智人頭骨更為接近,作為早期智人的一種類型,似較為合適。其生存的年代根據頭骨特徵估計在距今10萬年至20萬年左右。鈾系法測定人骨出土層位的初步結果是31萬年,準確的年代有待結合其他方面的證據來確定。」1987年4月《人民畫報》第4期上發表了《「金牛山」——猿人化石的重大發現》的文章和照片,再度把金牛山人稱為距今28萬左右的猿人(直立人)。爭論也就從此開始。

首先,吳汝康對這項人化石判斷錯誤提出批評說:「猿人頭骨的形態樣式是眼眶上方有粗厚的眶上圓枕,枕骨部分急劇轉折,頭骨壁厚,腦量小等等。而金牛山人頭骨的眶上圓枕並不很粗厚,枕骨較為圓隆,沒有急劇的轉折;頭骨壁較薄,其平均厚度為4.5毫米,遠小於北京猿人(平均8.1毫米),只是稍大於現代人(平均3.2毫米)。……這樣的形態特徵組合,使金牛

山人只能歸入早期智人而不能是猿人(直立人)。……」(吳汝康, 1987)

後來, 發掘主持人呂遵諤又對吳汝康提出了反批評, 他認為:「人類的演化是錯綜複雜的, 其體質特徵還受到種群的變異及個體和群體之間的差別諸因素的影響。因此晚期猿人和早期智人相銜接的兩端就會出現體質特徵彼此交叉和重疊的現象, 這種人類既保留有猿人的某些原始特徵, 又有智人的某些進步的特徵,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中間類型』。……但它所處的地質時代卻又是距今 28 萬年左右。……將金牛山人劃為晚期猿人階段, 考慮到它又有較多的智人特徵, 為了有別於晚期猿人,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智猿人』。」(呂遵諤, 1987 及 1988)

有些人問我, 你既是參加了「金牛山人化石科學鑒定會」, 那麼你的看法如何呢? 鑒定書就代表了 my 意見, 其中每句話都是經過斟酌的。我之所以贊成把它看「作為早期智人的一種類型似較為合適」, 除了吳汝康所指出的以外, 我還認為:

- (1) 上頷骨, 從鼻棘前基部至齒槽前緣正中點幾乎成一垂直綫。接近正頷型, 口緣不像北京人那樣向前突出;
- (2) 腭骨粗糙、凹凸不平, 和現代人接近;
- (3) 鼻棘發育, 是現代人的性質;
- (4) 門齒孔和上頷間縫的距離相當近, 是現代人的性質。

如果時代測定為距今 28 萬年左右是正確的話, 那麼發現早期智人比發現北京人的意義更大, 因為它可以給我們帶來新的問題, 即當進步的金牛山人出現之後, 北京人(即北京猿人或北京直立人)是否還在中國境內生存, 金牛山人和現代黃種人的關係怎樣? 大家一定會對這些問題感到更大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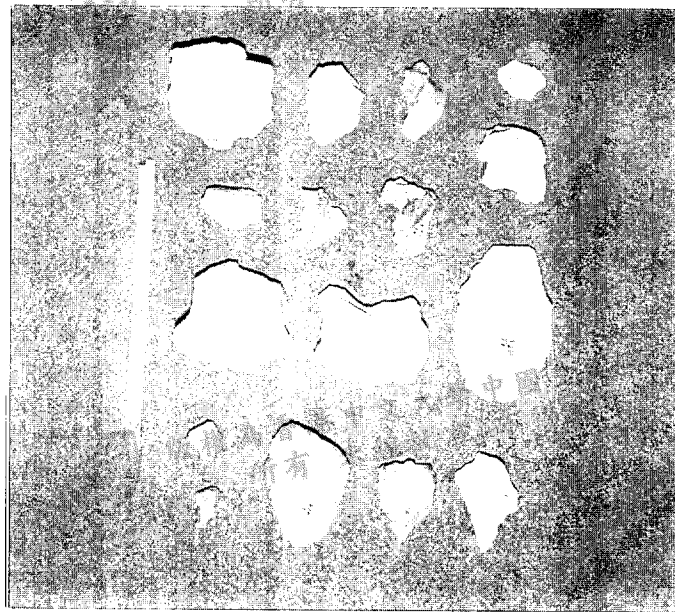
黃萬波等對金牛山遺址進行地層觀察之後指出:「早在中更新世中、晚期, 就堆積了一套以角礫和亞黏土為主的沉積物, ……大約在晚更新世早期, 次生洞穴再次形成, 才可能是金牛山人的生息之地。」(黃萬波等, 1987) 這個爭論還要持續下去, 但學術爭論是有好處的, 它可以推動科學前進。因為意見不同的各方都得搜尋各自的證據來說服別人, 彼此都得花費很大力氣。

## 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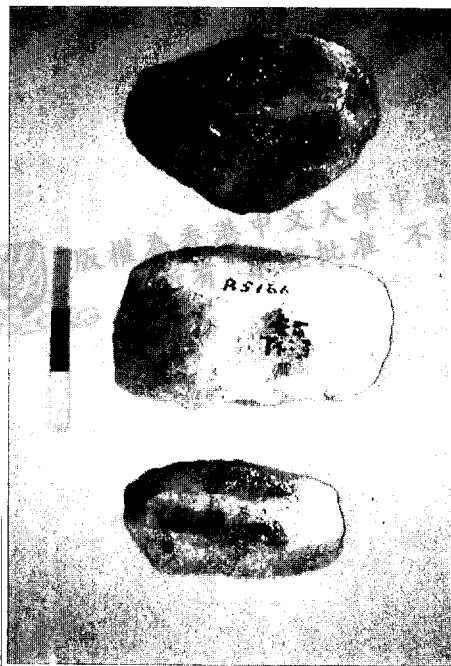
- 衛奇, 1985:《東谷坨舊石器初步觀察》。《人類學學報》, IV(4), 頁 289-300。
- 吳新智, 1988:《雲南元謀——研究人類分野的沃土》。《化石》, 1期, 頁 1、10。
- 吳汝康, 1987:《「金牛山人」是猿人嗎?》。《光明日報》, 6月 14日, 第三版;《化石》, 4期, 頁 1-2。
- 呂遵謬, 1987、1988:《對〈「金牛山人」是猿人嗎?〉一文的意見》。1987年 9月 3日,《光明日報》; 1988年,《化石》, 1期, 頁 9、6。
- 何乃漢、邱中郎等, 1987:《百色舊石器的研究》。《人類學學報》, VI(4), 頁 289-297。
- 張興永、姜礎、林一璞等, 1987:《從元謀「東方人」和「蝴蝶臘瑪猿」的發現三論滇中高原與人類起源》。《雲南社會科學》, 3期, 頁 48-50、80。
- 張鎮洪、傅仁義等, 1985:《遼寧海城小孤山遺址發掘簡報》。《人類學學報》, IV(1), 頁 70-79。
- 賈蘭坡, 1948:《黑水國探古》。《旅行雜誌》, XXII(12)。
- 徐淑彬, 1986:《山東沂源縣騎子鞍山發現人類化石》。《人類學學報》, V(4), 頁 398-399。
- 錢方等, 1988:《藏北高原各聽石器初步觀察》。《人類學學報》, VII(1), 頁 75-83。
- 黃萬波、尤玉柱等, 1987:《關於金牛山人遺址岩溶洞穴的探討》。《中國岩溶》, (1), 頁 61-68。
-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39 - 40: "On the Presumable Existence of a World-Wide Sub-Arctic Sheet of Human Culture at the Dawn of Neolithic". *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IX, pp. 333 - 339.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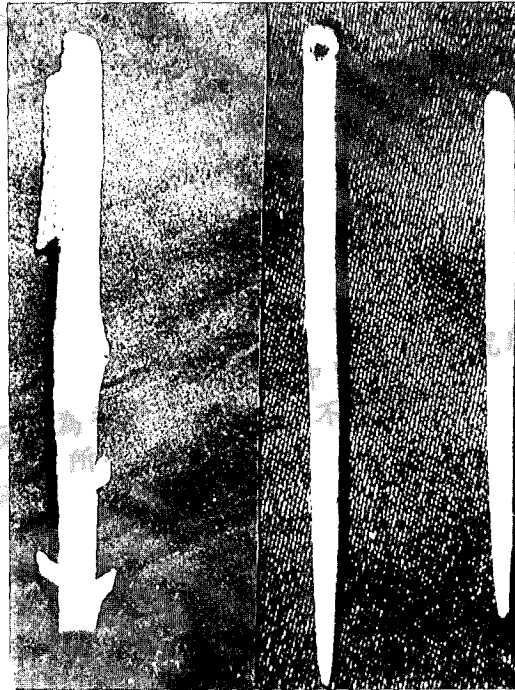


圖一 河北省陽原縣東谷坨遺址出土石器



圖二 北京周口店遺址出土北京人兩極石核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三 遼寧省海城小孤山遺址出土魚叉及骨針



圖四 遼寧省營口縣金牛山遺址智人化石出土情況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Recent Discoveries i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China

(A Summary)

Jia Lanpo

In Paleoanthropology and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recent discoveries of human fossils at Chin Niu Shan (Liao Ning province), Hê Hsien (An Hui province), Ch'i Chih Shan (Shan Tung province), the Hominidae fossils at Yüan Mou basin (Yün Nan province), paleolithic relics from Tung Ku T'o (Hê Pei province), and Hsiao Ku Shan (Liao Ning province).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se discoveries, especially on the fossils from Chin Niu Shan and Yüan Mou.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fossils from Chin Niu Shan belong to late *Homo erectus*.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fossils represent early *Homo sapience*. The Hominidae fossils from Yüan Mou are of Pliocene, and include three kinds of fossil apes at least. According to the primary report, the specimens from the upper Pliocene are of *Homo orientalis*, and the specimens from the lower Pliocene of *Ramapithecus hudiensis*. However, this identification is rejected by most anthropologists in China. The Yüan Mou fossils are sure to be hotly debated.